

华夏衣冠，端庄古今——论马面裙为何才是大方得体的着装典范而旗袍不是

陈童

(一)、为什么说马面裙大方得体

近年来，马面裙作为汉服复兴浪潮中的佼佼者，不仅走红于网络，更频频现身于街头巷尾甚至国际秀场。然而，伴随其流行，也有人提出疑问：这种源自古代的服饰，是否适合现代社会的各种场合？是否足够“大方得体”？现在我们将从事服饰结构、审美意蕴及现代适应性三个维度论证：马面裙不仅不违和，反而是当代社会中集端庄、优雅与实用于一身的“大方得体”之典范。

首先，从形制结构来看，马面裙的设计哲学天然契合“得体”的社交礼仪需求。

“得体”的首要含义在于保持仪态的庄重。马面裙之所以得名，源于其前后共有四个裙门，两两重合，侧面打褶，形如古城墙的“马面”墩台。这种独特的结构赋予了它极佳的功能性：当穿着者站立或行走时，前后重叠的裙门保持闭合，确保了穿着的严谨与端庄，避免了因动作幅度过大而可能产生的尴尬，极好地维护了仪表的庄重感；而当需要行走时，两侧的活褶又能提供足够的摆量，方便大步流星。

这种“静则端庄闭合，动则行云流水”的结构设计，既符合中国传统审美中“含蓄内敛”的君子之风，又完全符合现代社交礼仪中对服装整洁、遮蔽得当的要求。相比于某些过度暴露或紧身束缚的现代服饰，马面裙宽松适度，对身材包容性极强，无论高矮胖瘦皆能穿出风韵，这正是“大方”在物理层面的体现。

其次，从审美意蕴来看，马面裙的色彩与纹饰彰显了“大方”的文化气度。

“大方”不仅指衣着款式，更指由服饰衬托出的气质。马面裙沿袭了明代服饰的恢弘大气，其配色往往鲜明而不俗艳，织金、妆花等工艺的运用，使得裙身在光线下流光溢彩，贵气天成。

传统马面裙常饰以寓意吉祥的纹样，如龙凤、花鸟、云肩等，这些纹样布局讲究对称与平衡，传递出一种稳重、祥和的秩序感。这种视觉上的秩序感，往往能赋予穿着者一种沉稳、自信的气场。在现代着装语境中，

这种源自历史深处的华美，能够有效中和现代快时尚带来的廉价感与浮躁气，让穿着者在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从容不迫的优雅。这种不媚俗、不轻浮的美感，恰恰是“大方得体”最核心的精神内核。

最后，从现代适应性来看，马面裙具备极强的包容性与融合力，完美契合当代“得体”着装的多元标准。

一种服饰是否得体，关键在于它能否融入当下的生活场景。马面裙之所以能成为“国民爆款”，正是因为它打破了“古装”与“时装”的界限。它既可以搭配传统立领上衣，出席传统节日、茶会等正式场合，尽显礼仪之邦的庄重；也可以搭配简约的白衬衫、西装外套甚至针织衫，穿梭于办公室、商场与校园之间。

这种跨越时空的百搭属性，证明了马面裙并非脱离现实的“戏服”，而是具有生命力的“华服”。在职场中，马面裙利落的线条与现代着装的干练相得益彰，既不失职业感又增添了一份独特的东方韵味；在日常生活中，它既比裤装多了几分飘逸，又比西式裙装多了几分端庄。能够自如地应对现代生活的多元场景，不突兀、不违和，这正是“得体”在当代语境下的最高体现。

综上所述，马面裙之所以堪称大方得体，是因为它在外在结构上做到了严谨与舒适的统一，在内里审美上实现了传统与自信的融合，在现实应用中完成了古典与现代的接轨。它不以暴露为美，不以怪异吸睛，而是以一种从容、舒展、包容的姿态，诠释了何为“衣冠载道”。穿上一袭马面裙，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，更是在喧嚣的现代社会中，对自我形象一种庄重而优雅的表达。这，便是马面裙大方得体的最佳注脚。

（二）、为何旗袍成了风月场所的“标配”？

在影视剧、老照片乃至现代人的想象中，提到风月场所，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往往伴随着悠扬的留声机、昏黄的灯光，以及那一袭袭修身曼妙的旗袍。旗袍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，与“风尘”、“魅惑”、“旧上海”紧密相连。

为何这种原本是满族妇女传统服饰的装束，会演变成风月场所的“制服”？这并非巧合，而是历史演变、与社会阶层流动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要理解旗袍为何频繁出现在风月场所，首先要回到民国时期的上海。

1920至1930年代，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，也是时尚的中心。彼时，旗袍经历了巨大的变革，从原本宽大平直的线条，演变为吸收西方立体剪裁、收紧腰身、突显曲线的“海派旗袍”。

在那个时代，谁是最早的时尚引领者？并非循规蹈矩的大家闺秀，而是交际花、名伶以及高级妓女（当时的称呼多为“书寓先生”或“长三堂子”）。良家妇女往往在时尚潮流上趋于保守，而风月场所的女子为了招揽客人、体现自己的“摩登”与“高级”，必须走在时尚最前沿。

于是，一种奇特的现象出现了：旗袍越是修身、越是采用时髦的面料（如丝绒、镂空纱），越能展示穿着者的身份与品味。风月场所成了旗袍新款式的秀场，当红名妓身着开叉极高、剪裁贴体的新式旗袍出入于舞厅与酒局，这种装束便被贴上了“诱惑”与“开放”的标签。

风月场所并非只有低级的肉欲，尤其是旧时的高级妓院和交际场所，贩卖的往往是一种“情感体验”或“名媛幻觉”。

旗袍在民国中后期，也是宋庆龄、林徽因等知识女性与名媛的日常装束。风月场所的女子身着旗袍，潜意识里是在进行一种“阶层模仿”。

通过穿着与良家妇女、甚至上流社会女性相同的服饰，她们模糊了“卖笑者”与“良家女”的界限。对于客人而言，这种着装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——他们消费的不仅仅是肉体，更是一种仿佛在与大家闺秀谈情说爱的假象。旗袍赋予了风月女子一种可以“登大雅之堂”的皮囊，使其在推杯换盏间显得不那么露骨，增添了风月场所的“雅趣”。

除了历史原因，现代人对“旗袍=风月”的印象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影视文学的强化。从《海上花列传》到王家卫的《花样年华》，再到《金陵十三钗》，导演们偏爱用旗袍来讲述女人的命运。在《花样年华》中，苏丽珍的旗袍代表着压抑的情欲与道德的束缚；而在《金陵十三钗》中，玉墨等人的旗袍则成为了风尘女子身份的象征，她们用妖娆对抗残酷。

影视作品为了视觉语言的统一，往往将旗袍与烟雾、旗袍与雨巷、旗袍与靡靡之音剪辑在一起。久而久之，旗袍就成为了“暧昧”的代名词。当我们在屏幕上无数次看到风月女子身着旗袍摇曳生姿，现实中的联想便被彻底固化了。

（三）、结论

总之，旗袍代表的是一个旧中国，一个民国时期的中国，而马面裙才可以代表一个复兴的中国，一个结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中国。马面裙是大方得体的，而旗袍不是！